

对话

《世界文学》:为中国文坛引来“天火”的杂志

□余中先 黑丰

从本期起,我们将陆续发表对国内几家重要外国文学期刊主编的访谈,这些外国文学期刊为我们了解外国文学概况打开了形形色色的窗口。对话将围绕刊物历史沿革、办刊宗旨、刊物现状等方面展开。

——编者

余中先:《世界文学》主编
黑丰:《北京文学》编辑

黑丰:据知,《世界文学》刊物的前身是鲁迅于1934年创办的《译文》杂志,1953年7月由中华全国文学工作者协会创办。为了纪念鲁迅先生,继承他创办《译文》杂志的传统,刊物当时就定名《译文》(月刊),并由茅盾先生担任首任主编。当时的刊物是怎么定位的,办刊宗旨是什么?

余中先:说到鲁迅先生等人办的《译文》,这当然是我们的前身,但那主要是一种精神上的继承。至于1953年创办的杂志为何仍以《译文》为名,我们可以用茅盾在“发刊词”中的一句话来解释:“为了纪念鲁迅先生当年艰苦创办的《译文》并继承其精神,这一新出的刊物即以《译文》命名。”这是新中国第一个专门介绍外国文学作品和理论的刊物。新《译文》在开本、篇幅、文图并茂,以及某些体例的设置(如介绍外国作品须有前言或后记或作者简介等)诸方面都沿袭了鲁迅创办《译文》时的做法。《译文》当时为月刊,篇幅200页左右,译载的均为文学名著以及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亚非拉国家的文学作品,并刊登世界文艺动态和插图作品。《译文》的首任主编是茅盾,副主编陈冰夷,编委会由艾宝权、茅盾、陈冰夷、董秋斯、楼适夷、罗大冈、丽尼等人组成。

黑丰:1959年《译文》(月刊)正式更名为《世界文学》,1965年至1976年停刊,1977年复刊至今(计340期),从《译文》到《世界文学》,从停刊到复刊,其办刊理念是否一致?在选编和译介上有何倾向性?

余中先:1959年1月(总第67期)起,《译文》改名为《世界文学》(在封二上继续保留了《译文》的原名)。因为从当年起,刊物革新了内容,在刊登外国优秀作品的同时,也发表一些由中国作者自己写的评论文章,以求帮助和引导读者更好地阅读外国作品。曹靖华继茅盾之后任主编,陈冰夷为副主编。在改名《世界文学》的那一期中,编者在“致读者”一文中强调:“尽管我们刊物的内容改变了,但是继承鲁迅先生的《译文》的光荣传统,是始终不变的。”

1965年因国内文艺界整风,《世界文学》停刊一年。从1966年起,《世界文学》改为双月刊,但是因为文化大革命爆发,刊物仅仅出了一期便从3月起停刊,一停就是10年多。1977年10月,《世界文学》复刊,作为内部发行的试刊,共出了两期(双月刊),不在总编号之内。促使《世界文学》在当时复刊的重要原因,首先是10年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国读者对外国文学读物的期望十分殷切。复刊第一期的“编后记”中,已经强调“介绍和平论各国文学应当从实际出发”,“反映外国文学的实际面貌”。这大致可解释复刊的指导思想。在中央提出“实事求是”、“解放思想”之前,《世界文学》就在讲“实际”了。但由于当时还是“两个凡是”的时代,我们在介绍外国文学时,还有不少束缚,例如,苏联鲍里斯·瓦西里耶夫的小说《这里的黎明静悄悄》当时分两期在1977年试刊上连载登完,但为了能让作品发表,编辑部还是把它

称作“修正主义文学标本”,供批判用。由此回想“文革”之前,《世界文学》一度跟着苏联,发表了很多苏联和东欧国家的作品,一度又反帝反修,发表了亚非拉各国的不少“进步”、“独立”作品。当然,即便在那个时代,杂志对欧美的经典作品的介绍也没有中断。

改革开放后,《世界文学》对外国作品的介绍逐渐走向客观公正。可以说,上世纪80年代刊物发表的作品是相当有分量的,也是相当有眼光的。这一方面是因为,当时国内的外国文学出版事业还不完善,《世界文学》等刊物在介绍外国文学时,几乎是仅此几家;另一方面也是因为“文革”10年的中断以及拨乱反正带来的思想解放,让许多亟待介绍的优秀外国文学作品蜂拥而入。这一现象一直持续到80年代末,90年代后就走向了平稳。

黑丰:随着极端工具理性时代的到来,休闲和消费越来越成为了人们的一种时尚。大众社会的文化工业制造着文化趣味和文化要求。人们要求纯消费、“故事会”阅读,要求通俗易懂、喜闻乐见。朦胧不读,“艰深”不读,“诘屈聱牙”不读,多种理由可以不读。作为一本严肃的纯文学刊物,尤其是一本具有广泛声誉与深刻影响的外国文学刊物,面对如此“严峻”、“陡峭”的市场环境,你们是否考虑有所调整,在选稿、厘定、编译的标准上是顺应读者“口味”,还是有所执著,将改变、引领和提升读者美学趣味放在第一位,把建构和重塑人的精神品质放在第一位?

余中先:有些话不用多说,事情做来就行了。我们分析上世纪90年代以来的文化形势意识到,整个世界的文化越来越体现出商业化、产业化的倾向,阅读——尤其是文学阅读——越来越让位于视听媒体的传播。国内也已发生此类的转向:文学不再作为人们业余享受的主要精神食粮和娱乐形式。但我们始终认为,在这一文化转型的大环境中,《世界文学》并不随着世俗趣味的改变而改变自身原来的办刊方针。我们坚信,在中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地域广阔、人们文化结构多层次多差异的国家中,《世界文学》应该为那些渴望了解世界各国的经典文学、了解各国民文学发展动向的人们,保留一个窗口,提供一片风景。

所以,尽管国内的一些刊物纷纷改版,改

方针,改内容,我们却始终没有大改,依然承继着鲁迅、茅盾等先辈的一些做法。当然,也要考

虑与时俱进,我们的栏目多少有些改动。一开

始有的小说、诗歌、散文、剧本、评论等栏目依

旧存在,又增加了“文化交流”、“外国文学资

料”、“世界文艺动态”、“中国作家谈外国文

学”、“文坛热点”等,以期更为丰富多彩。

黑丰:《世界文学》被人们誉为是一本“为

中国文坛引来‘天火’的杂志”。请问您怎么看

待这一“天火”和作为“盗火者”的《世界文学》?

作为发明“火”的古老国度,我们需要“天火”的

熊熊燃烧吗?

余中先:“天火”的隐喻本是神明所握的

秘密之“火”,有些像“潘多拉之盒”,不是凡人

能动用的。当然,隐喻也在变,多年来,“天火”



之喻已经引入了新的外延和内涵。

中国读者需要外国文学的滋养,恰如大地上的凡人需要奥林匹斯山上的神界之火。在鲁迅时代,盗“天火”也可以说成是“为奴隶贩运军火”,或是“拿来主义”。后来,大致可以用“洋为中用”来概括,尽管,“汲取外来文化”上面加了很多框框的约束和限定,如“先进”、“革命”、“批判”、“现实”,等等。但如今在多元文化与经济一体的矛盾世界中,我认为,对外国文学的介绍大可不必加什么思想意识方面的框框,了解人家,就应该全面、客观地了解。人家的文学是什么样,就把它原原本本地介绍过来。选择标准就是文学价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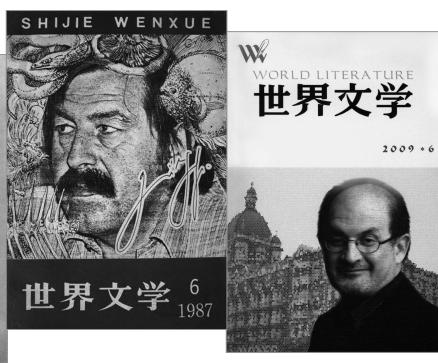
我个人认为,文学的“天火”不是熊熊燃烧的大火,而是烛照心灵的微明之火。一方面,文学不会成为改造世界的有力工具;但另一方面,文学毕竟是人认识世界、认识自己的最好文本,也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精神文明的有机构成成分,而且是最深刻、最内在的成分。它不同于种种的流行文化,只要人存在,文学就在。它对人的影响是基本的、骨子里的。外国文学对中国读者的影响也将是普遍性的、人类共通的,我们再见一见为好。

黑丰:探讨一下翻译问题。您是享誉国内外的翻译家,获得法国政府授予的文学艺术骑士勋章。我知道译作“总是晚于原作”,而且译作总是生生不息的“原作”的延续和它们后世的“潜在永生”。翻译是艰难的,但仍是可译的,那么如何将原作中的“魂灵”成功地移植到译作中去,或者说如何在译作中召唤原作威蕤森林中的“魂灵”?你如何看待严复提出的“信达而外,求其尔雅”的理念?您认为严格按此理

念实施,译作可“信”吗?

余中先:我只有翻译的实践,没有翻译的理论。有的人谈翻译,专谈理论,但拘泥于理论探索,缺少鲜活的实际例子。有人谈翻译,专谈实践,比如我就是这样,我自己平时只注意细节,不太能把握理论。当然,对我自己的翻译,我有一些经验教训总结,对别人的翻译,因为读得多了,也能看得出优劣良莠。用最简单的话来总结,我认为,文学翻译只要做到两点,大致就可算得上是好的译作了。一是,能忠实地理解外语原文,包括感觉到其语言特色;二是,用通顺的汉语来表达,包括用同样的文体来转达原文中的语言要素。这大概就相当于前人所说的“信、达、雅”了吧。

脱离了具体的文本,翻译中的有些东西



文学》没有关于“国外文艺思潮”栏目呢?可以将他们的宣言、口号、文献资料、代表作建档,归于一处集中刊出。这种工作不是说没做,但很少,没有专门的栏目。不知以后是否有所考虑?

思想与语言、现代与传统、现实与超现实、写作与当下的困境等都有自己的焦点和焦点,《世界文学》是否考虑对世界文学创作中的“焦点与焦点”予以关注?

余中先:这个意见很好,思潮很重要,

但翻译起来很难。目前国内已经有很多外国文学思潮的作品出版,但翻译得好的很少。首先,有理论思想作品不好译的原因;再有,欧洲的许多思潮,在欧洲并没有太大反响,经过美国,便成大气候,转而影响到中国,但翻译多为英语的转译,中间有误解,有丢失,有缺损。

目前,文学世界应该没有什么重大流派,重大思潮,也缺乏大师和传世杰作。世界经济一体化和文化产业化趋势,导致各国并无大波折,无大苦难,也很难有大作品出来,需要等待。我们研究外国文学只有等待,总不能把人家二流的作品吹捧为一流或超一流吧。

黑丰:我听说《世界文学》的网络很糟糕。某读者曾在《世界文学》网站上搜索它的历年总目,结果很失望,一无所获。被搜的还有《译林》,说“这两本杂志提供的数据太不准确”,“《世界文学》的内部数据搜索引擎又太烂”(我也查过,确实不好找)。这是怎么回事?不知《世界文学》关于网站和网络版的建设方面有何新的思路、规划和补救措施?

余中先:确实,我们没有专人做网络。

杂志现在属于中国社会科学院外文所主管,外文所

所有一个网络小组,在帮助我们做这方面的工

作。社会上有一些人曾跟我们联系,要做《世界文学》的网络工作,但社科院外文所领导坚持由院所统一考虑各家杂志的网络建设。这方

面正在做,但估计速度会不紧不慢。对不起读者了。

黑丰:《世界文学》以前用纸很白,也反光,看久了眼睛疲劳。好像从2010年开始,用纸好多了。其他如封二封三还是精美的外国文学名著插图、美术作品,封面还是作家肖像,页码还是那么多,320页。在新的一年里,想到过改变一下吗?是否考虑增加内页增添页码?另外,《世界文学》国内外订户情况怎样?谢谢!

余中先:2010年以来,杂志的用纸有了改

进,同样320页的杂志,放在书架上明显比早

先的厚了一些。外表上,《世界文学》从2000年

以来一直没有大变,为的是让人从其他书刊中

一眼就能认出来。我们可能有些保守,不太想

在外表上多改动。

国内的订户近年来一直稳中有落,这与我

国国民的阅读尤其是青少年的阅读状况大致

一致。至于国外的订户,原本就少,现在一直也

很少,但一些图书馆是订的。

我译《卡彭塔利亚湾》

□李尧

小说《心中的明天》、原住民青年作家阿尼塔·黑斯博士的《我是谁?》。这些作品都从不同侧面增加了我对澳大利亚原住民的了解。与此同时,我翻译的几部白人作家的作品,包括澳大利亚文学大师、1973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帕特里克·怀特的长篇小说《树叶裙》、尼古拉斯·周思的《守望者》、亚历克斯·米勒的《别了,那道风景》、《浪子》都用很大的篇幅描写了原住民在澳大利亚不同历史时期的生活。所有这一切,都让我产生了一种错觉,以为自己完全有能力胜任这本书的翻译。特别当我得知亚历克斯·赖特的曾祖父也是华人之后,不但顿感亲切,而且信心倍增,似乎因为她也有华人血统,

她说的没错儿。这本书真的有“那么

就降低了这本书对于我的难度。及至打开朋友尼古拉斯·周思从悉尼寄来的《Carpentaria》,刚看了几页,卡彭塔利亚湾那一泓碧水,就掀起滚滚波澜。亚历克斯·赖特说:“我写这本书的时候,并没有梦想谁会读它,我只是想写一个告慰祖先亡灵的故事,尽管心旌荡漾的时候,也曾希望世界各地的人都能阅读和理解它。但我并没有想到,那就意味着需要有人把它翻译成别的文字。更没有想到,要把这本书里那么多原住民的语言以及表现我家乡卡彭塔利亚湾的风土人情、反映我同胞世界观的文字翻译成另外一种语言是何等艰难!”

她说的没错儿。这本书真的有“那么

多原住民的方言土语”,这是它的特色之一,无可回避。我不由得倒吸了几口凉气。

不过,冷静下来,仔细想一想,所谓“方言土语”毕竟是形式和表面的东西。

我可以把它们积攒起来,隔一段时间让

“伊妹儿”去向作者请教,再回来告诉我,

那些话是什么意思。像查字典一样,虽然

费事,但并不难。真正困难的是,“卡彭塔

利亚湾的风土人情”,是“反映我的同胞

的世界观的文字”,特别是他们古老的传

说和神话、他们部落间由来已久的矛盾

和现实生活中的冲突。面对这一道道难

题,我仿佛走进一片沼泽,步履艰难。这

时候,我才意识到自己的浅薄,意识到自己

对澳大利亚原住民的认识与理解纯属皮毛。我才清楚地看到对面屹立的是一

座蕴藏着澳大利亚原住民文化与历史的

品位极高的矿山!

翻译者其实也是个采矿工,把世界

文学宝藏采集来,经过艰苦的冶炼,变成

属于我们自己的财富。我还算一个勤劳

的“矿工”,意识到自己在相关领域的知

识匮乏后,立刻开始阅读能找到的和澳

大利亚原住民有关的书籍。我虽然早就

知道,澳大利亚原住民已经在澳洲大陆

繁衍生息了四万多年,他们不只分布在

加布老人居住的南太平洋沿岸风光秀丽

的丛林地带,还居住在澳大利亚西北部

吉布森沙漠以北广大的不毛之地——大

沙漠,居住在北部领地达尔文港以及

周边地区类似卡彭塔利亚湾的山水之

间。但我对于他们内部复杂的社会结构

知之甚少。读了澳大利亚著名的“沙漠艺

术家”——原住民吉米·派克的传记《沙

漠之子》,我才知道,他们遵循的是一个

按照部族和分支部族,或者所谓“皮肤”

进行划分的体系。简单地说,那是一种从

概念上把整个社会划分成二、四或者八

个种类的体系。一个人属于哪个“种类”

取决于母亲那个部族。同一个部族的男

人或女人只能和与之相对应的那个部族

的女人或男人结婚。这样以来,一代代人

